

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 意蕴、特征与建构路径

樊志宏 肖 尧

摘要：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是推动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布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和安全保障，这一战略理念最早可追溯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来的“156项工程”与“三线建设”等区域发展战略。新时代背景下，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是在“无人区”竞争中探索多元化科技突破路径、防止锁定某一或局部发展路径陷入战略性失误的重要一步。通过梳理建设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相关政策的历史演进，可以发现信息产业革命等趋势下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呈现的新特征，因此战略腹地应超越传统的地理和经济概念、被辐射和被引领的落后地区概念和三维时空，把功能定位于具有战略纵深的科学探索“无人区”、体现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地区和核心地区和虚拟时空中汇集要素流动的网络功能中心。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战略腹地；关键产业备份；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25）09-0096-11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是“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条原则之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交织的“两个大局”背景下，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是推动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布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和安全保障。建设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历史根源最早可追溯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来的“156项工程”与“三线建设”等区域发展战略，而“国家战略腹地”的概念尚属在新时代背景下在国家政策层面首次提出。2020年，

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研究”（24&WZD14）

作者简介：樊志宏，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肖尧，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一文中提出,要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保障国家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①这是首次关于“产业备份”的论述。2023年7月,习近平在四川考察时强调,新时期、新时代还是有一个大后方的概念的,而今这个后方的意义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这表明,当前建设战略腹地的时代背景、建设实质、重点任务、路径机制等方面已经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有着自身逻辑与时代特征,必须采取新的战略思路和机制举措加以推进。

现有研究集中探讨了建设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目的、内涵特征及选址策略等关键问题。一是从建设目的来看,现有研究重点围绕国家安全需求展开,认为建设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是拓展国家战略纵深、夯实国家安全基石、实现高水平安全的重要举措,建立自主、稳定、安全的产业链与供应链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②为了应对紧急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断供”风险,亟须建设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这体现了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建设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核心内容是构建产业转移恢复与资源保障机制,确保国家在面对国际政治、经济波动等外部冲击时,能够迅速有效地进行产业链的转移与恢复,保障经济的稳定运行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也有学者指出,建设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是新时代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区域发展战略调整的重要考量。^③随着国家推进实施“东北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大战略,中西部地区的拓展纵深成为国家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还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培育以城市群为形态的区域增长极,助力国家级城市群高水平发展。通过优化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发展战略,能够激发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二是从内涵特征来看,现有研究普遍强调战略腹地需要在生产供给、经济基础、产业承接以及资源生态保障方面具备强大能力。战略腹地应当具备快速的生产供应能力和便捷的交付渠道,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迅速响应市场和国家的需要,有效支撑总体经济的运行。战略腹地需要具备强大的产业承接能力,以及丰富的资源供给及生态安全保障能力。通过构建多元、安全的资源供应体系,提升国家应对风险和挑战的能力。三是从选址策略来看,大部分研究认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具备成为战略腹地的理想条件。^④在地理位置方面,建设战略腹地需要考虑到其对国家战略全局发

① 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求是》2020年第21期。

② 焦勇:《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备份的大国方略》,《经济学家》2022年第11期;刘云中、庄嘉莉、肖磊:《“十五五”时期及未来一段时间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任务和政策建议》,《区域经济评论》2024年第6期。

③ 蒲清平、马睿:《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内涵特征、重大意义和推进策略》,《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王小广、周擎擎、梁雅楠等:《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区域经济评论》2024年第5期。

④ 龚勤林、宋明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内在逻辑、现实基础与路径选择》,《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展的重要性，一般是邻近国家级的极核或先行地区、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发展的内陆纵深区域、全局发展中的交通枢纽点，能够为国家战略提供坚实的地理支撑。在资源要素方面，战略腹地应当是经济活跃、资源充足的要素集聚区，拥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根据上述条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会处，是中国西部的重要城市群，具有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及技术等生产要素，显示出其作为建设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选址的优势。也有学者提出，除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东北、新疆等邻边交界地区也是建设战略腹地的重点选址。这些地区具有对外开放的门户功能，是国家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在这些地区打造若干综合功能区，能够提升区域和国家的发展韧性。^①还有学者将中部六省和川渝陕等省市视为经济发展的区域战略腹地，通过构建完整发达的战略辅链作为二线保障，配合长三角、珠三角组成的南方主产业链和华北、山东及东北组成的北方主产业链，形成“二主一辅”格局，发挥重要的“中间枢纽”支撑作用。^②

现有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讨论缺乏动态性和时效性的发展视角，仅仅停留在静态布局和功能定位上，尚未全面系统地回答新时代与“三线建设”时期建设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异同问题，未能充分关注同一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外部环境变化时的内涵演变和外在表现的调整。二是过于侧重传统地理空间布局，未能充分考虑信息化、智能化、虚拟空间等维度对建设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重要影响。三是内涵理解不够全面，多强调战略腹地在保障国家安全、产业安全等方面的基础性功能，未能全面把握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科技、教育、生态等方面的综合价值。本文在尝试理解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建设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是探索多元化科技突破路径的手段和保障未来大国竞争主导权的重要一步。为此，本文梳理归纳了建设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历史演进，阐述了信息产业革命和未来“无人区”竞争等趋势下建设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新特征，并提出了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思路原则和路径模式。通过探讨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新思路和新路径，为宏观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新时代与“三线建设”时期建设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差异

从表面上看，虽然新时代与“三线建设”时期建设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在应对“卡脖子”难题、增强产业链韧性等战略目标上存在一定的共性。但如果结合“两个大局”

① 马涛、王晓磊、王昊等：《“十五五”时期东北地区承接东南沿海关键制造业备份能力：理论内涵、识别测度与提升路径》，《区域经济评论》2024 年第 6 期。

② 王小广、周擎擎、梁雅楠等：《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区域经济评论》2024 年第 5 期。

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将建设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视为探索多元化科技突破路径的重要手段的话，那么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不仅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和优化生产力布局的需要，更是在未来“无人区”竞争中，防止锁定某一或局部发展路径陷入战略性失误、保障未来大国竞争主导权的必然之举。

（一）“三线建设”时期建设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背景和意义

20 世纪中后叶，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冷战格局逐渐成型，全球地缘政治摩擦日趋激烈。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实施的遏制与封锁，以及中苏关系的突然恶化，我国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国家基于高度的战略警觉与历史责任感，提出了以“工业立国、加强国防、保障内需”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总体战略思维，着手有计划地将核心工业项目由沿海转向内陆，建设坚固的国家战略腹地，推动关键产业备份的系统性布局。这一战略抉择不仅是应对外部安全威胁的必要举措，更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路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156 项工程”与“三线建设”构成了两个关键性的历史节点，标志着中国国防工业与重工业体系建设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重要跨越。

“156 项工程”，即 1953 年至 1957 年期间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框架下重点推进的 156 个大型建设项目。这些工程多由苏联援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工业化的起点，涵盖冶金、能源、机械、化工、国防等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在规划这些项目时，不同于传统沿海集中布局的发展模式，充分考虑了安全防护、资源供给与交通条件，将大量项目落户于如辽宁、陕西、四川、湖北等省份，以期在战时具备抵御外敌入侵、实现工业自循环的能力。其中，武汉钢铁公司作为国家“一五计划”的重中之重，不仅因地处长江中游、交通便利、资源丰富脱颖而出，更承载着打造中部工业重镇的战略目标；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发源地，其开启了国产重型机械制造的序幕，支撑了后续工业体系中装备制造的基础骨架。

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在意识形态与边境问题上分歧日益明显，国家安全风险大幅上升。在此背景下，1964 年“三线建设”明确提出“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将工业建设重心由第一线（沿海）和第二线（中部主要城市）向第三线（中西部山区）转移。这项战略工程从 1964 年持续至 1978 年，历时 15 年之久，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发展史上规模最大、跨度最广、投入最多的区域性战略工程之一。“三线建设”不仅是工业选址的调整，更是国家安全思维的一次重大跃升，其目的是构建一套战时可持续运转、平时能支撑全国工业经济运行的“工业备份系统”，从而在极端情境下依然能够保障国家经济的基本运行与国防工业的连续产出。根据规划，“三线建设”覆盖十三个省（区、市），主要集中在西南（四川、贵州、云南）、西北（陕西、甘肃）和中南部分山地省份（湖南、湖北），重点发展军工、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动力、交通等关键产业门类。这一时期国家投入了空前的资源，大量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和军工单位整体西迁，“背着家当上山”的迁建成为一代工程技术人员的记忆；超过 3000 多个重点项目在三线地区拔地而

起，催生出了一批具有战略影响力的工业城市。^①例如，洛阳不仅发展成为了重型机械制造重镇，还在航空、军工领域形成了集群效应；西安作为“三航一核”技术核心区，承担了国防科技体系的关键研发任务；攀枝花在艰苦环境下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钒钛磁铁矿基地和综合钢铁企业，其选址于金沙江峡谷之中，是战略隐蔽与资源富集的典型结合体。“三线建设”还深刻改变了中国区域经济的空间格局，原本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和内陆地区，借助国家资源倾斜和政策扶持，形成了一批以工业为主导、功能配套齐全且类型多样的现代城市体系。例如重工业城市（攀枝花、宝鸡）、综合性工业城市（贵阳、安康）、军工主导型城市（绵阳、遵义）、工业兼交通枢纽型城市（柳州、南充）等，这些城市不仅承担起了工业化和国防保障职能，还成为了后续区域发展政策（如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基础支点。值得注意的是，“三线建设”虽然出于国防动因，但其长期效应远超预期，它有效缓解了区域发展不平衡，为后续中国工业体系的全面布局奠定了地理与资源基础，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战略视野和工程能力的干部与工程技术人才，为改革开放后新一轮的工业腾飞储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人力基础。

从“156 项工程”到“三线建设”，中国在 20 世纪中期围绕建设战略腹地与关键产业备份进行的大规模工业部署，不仅是对国家安全的理性回应，更是对国家经济发展逻辑的深度调整，其历史意义不仅体现在推动中国工业体系从无到有的奠基作用，更在于形成了以国家战略为核心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为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与关键产业备份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

（二）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提出与进展

2024 年以来，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建设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加速落地。2024 年 3 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2024 年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这表明国家在战略层面上正构建更加均衡和安全的产业布局。四川、重庆等多地积极响应中央战略部署，结合资源禀赋差异化推进，均提出了自身建设战略腹地的配套文件，构建了不同的建设模式，力求与国家战略实现协同联动。《四川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提出，“四川省地处长江上游、西南内陆，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是支撑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地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推进大会提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重大部署，在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上实现新突破”；重庆市委六届五次全会提出，“在打造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动力源、构建内陆高水平开放新格局、建设国家战略腹地上发挥‘三个关键支撑’作用……主动承接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重大任务”。除了川渝之外，湖北、湖南、江西、贵州等地也都提出了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想法。2025 年，《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抢抓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两重’‘两新’等政策机遇”；《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

^① 周明长：《三线建设与中国内地城市发展（1964—1980 年）》，《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 年第 1 期。

提出“加快建设‘三基地一枢纽’，打造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江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争取布局建设全国重要产业备份基地、战略性物资储备基地、科技创新战略腹地，打造国家战略腹地重点支撑区域”；《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抢抓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机遇，加快推进2个国家重大产业备份项目建设，做强贵州航空产业城，推动国产大飞机配套产业在黔延伸布局”。

（三）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面临的新变化

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建设所面临的国际局势、技术革命趋势、大国发展阶段和制度逻辑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赋予了其探索多元化科技突破和把握未来竞争主导权的深远意义。新时代与“三线建设”时期之间建设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面临的主要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局势发生变化。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国际局势持续紧张且复杂多变，大规模世界性热战的风险依然存在。中国基于深远的战略考量，将核心工业项目有计划地部署于内陆腹地，将国家发展的重心进一步向内陆深处推进，旨在强化国防安全屏障，稳固物理隔离布局，以应对外部威胁与内部挑战。^①当下，距离20世纪60年代已过去60多年，爆发大规模世界性热战的概率大大下降。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是推动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布局，也是突出“战略安全”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物质基础和安全保障。比较来看，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体现在建设战略腹地的重点任务上，即由建设物理战争的“大后方”转向建设科技竞争的“大后方”。因此，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更注重应对全球科技竞争、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而非单纯的军事防御。

第二，技术革命趋势发生变化。20世纪60年代，技术更新迭代的速度较为缓慢，工业发展主要依赖于传统技术的逐步改进。当下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信息革命、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领经济长周期转型，技术更新迭代的速度十分迅速。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背景下，单一或局部的科技突破路径存在巨大的风险隐患，一旦锁定某一发展路径，可能会导致战略性失误，错失竞争主导权。例如，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人工智能奠基人杰弗里·辛顿，说明非主流的科技路径也可能在极短的时期内异军突起，成为改变世界的重大突破。比较来看，技术革命发展趋势发生的变化体现在建设战略腹地的路径上，即由集中于某一主流路径转向保有各种路径的可行性，尤其是曾经不被看好、但未来却有巨大潜在价值的路径。

第三，大国发展阶段发生变化。20世纪6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10余年，工业力量和经济体量与世界强国存在巨大差距，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才建立起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该阶段具有明显追赶、跟跑、模仿特征，

^① 郑有贵、陈东林、段娟：《历史与现实结合视角的三线建设评价——基于四川、重庆三线建设的调研》，《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3期；徐有威、陈熙：《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4期。

技术路径选择受制于国际环境，创新活动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当下，我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势呈现历史性提升，布局逻辑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塑造，由跟跑逐渐发展到并跑、领跑和自主创新、原始创新阶段，发展目标升级为在未来“无人区”竞争中争得领跑地位并主导建立规则。比较来看，中外国家发展阶段发生的变化体现在建设战略腹地的心态上，即由被动应对“卡脖子”难题转向与西方发达国家争夺竞争主导权。

第四，制度逻辑发生变化。“三线建设”时期依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资源配置方式是定向调拨指令。当下，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治理的新范式，同时激发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比较来看，制度逻辑发生的变化体现在建设战略腹地的动力系统之上，即由行政指令驱动转向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

三、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主要特征

新时代背景下，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主要特征需要重新定义和构建。与“三线建设”时期以备战为主导的战略腹地概念不同，当下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更为复杂的功能体系和更高维度的国家使命，不只是地理上的“后方”，而是融合战略纵深、安全冗余、系统抗冲击能力和产业协同创新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区域功能体，其所体现的关键产业备份能力，更是国家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加剧等多重挑战下进行系统防范和应对的核心依托。它是突出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腹地、保障未来“无人区”竞争主导权的举措、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腹地、体现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载体。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从信息产业革命和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来看，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超越了传统制造业领域，需要进一步突出信息化和智能化。20 世纪 60 年代，曾有将重要学校和科研机构从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到西部偏远地区的地理迁移策略，战略腹地多指地理上远离沿海与边境、便于隐藏和防守的内陆地区，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战时的战略转移功能。随着信息革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不断深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经济社会，传统的地理迁移策略已不再是最有效的方式。网络空间时代，战略腹地的功能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支撑、从备用空间转向制度嵌入，其定位已不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转移接纳地，而是成为核心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应被视为一个技术、产业、制度的多维韧性系统，在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建成相对独立的技术链和产业链，具备一定的原始创新和再生能力，真正承担起系统性备份和主动功能，以适应全球化竞争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从未来“无人区”竞争要求来看，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超越了

地理空间的均衡布局，是防止锁定某一或局部发展路径陷入战略性失误、保障未来大国竞争主导权的举措。它体现了“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防范意识，代表了一国不同地区发展模式的另一种可能性。“无人区”竞争时期的创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模仿式追赶，而是体现为逆向培育和突破性创新的结构性跃升。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已经从单一的空间备份，演化为技术备份、人才备份以及制度备份“三位一体”的高能级体系，为国家核心产业提供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的全流程支撑。国家战略腹地不是简单的在地理空间上实现东、中、西的均衡布局，而应被视为探索多元化科技突破路径的深层次系统工程，能够提升国家在探索未知领域、开辟新路径时的成功率，为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机遇。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需要考虑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和备份方案，以提升国家在面对未知挑战时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

第三，从新发展格局要求来看，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超越了传统的内循环范畴，是建设服务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腹地。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战略腹地不再是封闭、孤立的后备区域，而是在数字化基础设施、交通走廊、能源通道等支撑下向全球安全节点和国际友链网络演化，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与全球网络深度嵌套。国家战略腹地不是简单的重复建设或备而不用和被辐射地，而是通过推动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发展，缩小不同区域差距，增强国内大循环的韧性，有效支撑国际循环，形成内外联动的产业备份体系。国家战略腹地在空间上涵盖多个节点城市、战略轴线和重要功能区；在功能上覆盖能源保障、物流调度、应急生产、科技孵化、产业承载等多种能力。它体现并支撑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其发展不仅要注重经济效益，还需兼顾文化遗产、社会进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多重任务，以及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服务和保障新安全格局。

第四，从高水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看，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是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重要载体。它超越传统的刚性管控调配模式和一蹴而就的行政决策，应被视为运用市场化手段变革资源配置方式的创新平台。“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混合动力系统既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又能充分释放市场活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在全国范围内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需要依托长期的制度化安排、协同治理结构和战略性投入体系，通过国家级新区、开发区、试验区等功能平台的设立，将制度创新、要素保障和政策激励嵌入到国家战略腹地发展之中，从而推动关键产业链的系统培育。

四、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相关建议

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不仅仅是对历史经验的延续，更是针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反思与前瞻性规划。基于前文对建设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历史沿革的系统性分析，综合考虑技术革命趋势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的需求，提出新时代建

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思路原则、重点领域及路径模式等相关建议。

（一）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思路与原则

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既是应对科学探索“无人区”的多元阵地，也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极，更是虚实交融的要素网络功能中心。

第一，超越传统的地理和经济概念，功能定位于具有战略纵深的科学探索“无人区”。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首先要在理念上完成一次超越式跃迁。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把产业搬出沿海、把项目塞进大山的地理搬迁，也不是简单通过行政指令把资源从发达地区平移到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输血。在新的坐标系里，国家战略腹地必须被重新定义为具有战略纵深的科学探索“无人区”。随着全球化竞争进入技术无人领航、产业无人领跑的深水区，传统的跟跑策略和集中资源押注单一方向的策略均已不再适用，在芯片光刻、量子计算、核聚变等前沿领域，既无明确对标对象，亦无成熟经验可循。科学研究和技术转化不应局限于当前的主流路径，而应鼓励多样化的探索和尝试，只有勇于进行多元化探索和开放性研究，才能成为领跑者，避免“卡脖子”难题。这要求国家战略腹地必须成为“多条路线并行、多种范式试错”的试验场，既允许“从 0 到 1”的原始创新，也包容“从 1 到 100”的工程迭代；既为“主流共识”提供规模化验证条件，也为“边缘突破”预留“容错沙盒”。通过规划部署差异化研究方向、差异化技术路线、差异化组织模式，形成分布式创新群落，提升国家实现科技突破的可能性。

第二，超越被辐射和被引领的落后地区概念，功能定位于体现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地区和核心地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不仅是对区域经济的优化，更是对国家安全、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全面支撑。过去的“战略后方”往往等同于经济洼地或政策飞地，实际上它不应被简单理解为落后地区或需要支持的地区，而应被视为重要的支撑力量和核心力量，这些地区在经济、产业、区位、能源、人口等方面具有关键优势，能够承载重大生产力和关键产业备份。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规划应当跳出“补短板”的旧逻辑，转向“锻长板”的新逻辑，通过未来产业的培育、高端科研机构科研力量的提升和高水平人才梯度的构建，加速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从接受辐射的腹地转向驱动发展的核心，成为后队变前队的典范。

第三，超越三维时空，功能定位于虚拟时空中汇集要素流动的网络功能中心。传统工业时代，生产要素的流动受限于三维时空。虚拟新时空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极大地拓展了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内涵，让曾经遥不可及的地区能够通过低成本的方式实现即时通信和信息交互，数据、算法、算力、资金、人才等要素均能以光速重新组合。随着“东数西算”“西存”“西训”“西渲”“大模型”等国家战略正在从全局到局部、从基础到应用，进行全方位的探索和实验，国家战略腹地的空间形态正突破物理疆域限制，成为虚拟时空的数字神经中枢，数字基础设施和高端科研力量应当成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一部分。通过布局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算法大模型基地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畅通信息流、数据传输、网络连接等要素流动，构建能够提供网络空间安全防护的战略腹地。

（二）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重点领域

第一，以人工智能领域为重点，打造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体系。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引擎，正深度重构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应当以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为依托，构建覆盖基础研发和场景应用的全链条人工智能产业备份网络；加快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医疗、金融、交通等领域的应用，构建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形成“东部设计+中西部智造”的跨区域协作模式；推动自动驾驶和智能网联汽车应用，提升交通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建设人工智能算力备份中心，构建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第二，以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为重点，激活存量经济新动能。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既是效率革命，更是战略备份的关键环节，需通过技术赋能和模式创新，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体系，依托平台赋能中小企业降本增效，重构制造业底层逻辑；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监测等技术，推广智慧农业、精准农业、农业物联网，夯实数字化农业的多元支撑；加快商贸服务、交通运输、文旅、教育、医疗健康等生活服务领域的数字化赋能，培育消费新场景。

第三，以未来产业为重点，布局全球科技竞争新赛道。未来产业代表国家长期竞争力，需超前布局量子科技、未来制造、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形成从产业转化到场景落地的备份闭环；探索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等未来信息技术，构建信息安全护城河，保障国家金融、能源领域通信安全；探索异构集成、先进封装等未来制造技术，重塑物质生产范式；探索可控核聚变、固态电池等未来能源技术，推动电力生产和储能革命；设立未来产业母基金，通过“投早投小”培育颠覆性技术。

（三）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路径模式

第一，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效能，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实施框架。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撑体系、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创新激励机制，提升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建设的效率和质量；优化产业投资基金体系，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关键产业和战略领域；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创新人才绩效考核与收益分配机制，加速人才资本价值转化。

第二，因地制宜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布局相适应的区域发展模式。由于各地区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人才储备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需充分尊重区域差异，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差异化分工，为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提供多重保障。立足“胡焕庸线”东西分异和南北梯度特征，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核心增长极，重点布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推动建设数字孪生工厂；在中西部地区着力建设新一代绿色数据中心集群，实现梯度化发展。

第三，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构建自主可控的创新体系。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在国家战略腹地布局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高端科研平台，推

动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无缝衔接，实现产业与科技深度融合；实施“人才矩阵”工程，建设高水平人才梯队，构建“课程共建—师资共享—人才共育”的产教融合新模式，夯实创新根基。

第四，破除跨区域合作的制度性障碍，构建统一大市场。物理联通层面，完善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出海出境大通道建设，加强国家战略腹地与国际市场的连接，形成“沿海—内陆—沿边”立体物流网络；制度联通层面，推行“标准互认示范区”建设，建立跨区域标准互认平台，强化先进标准创新引领。深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东部沿海地区一体化发展，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试点“产业共同体”模式，促进资源跨区域高效配置，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提供广阔发展空间和强大动力支持。

（责任编辑 赵 亮）

Connotation, Feature and Pathways of Building a National Strategic Hinterland and Backup of Key Industries for a New Era

Fan Zhihong Xiao Yao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rategic hinterland and backup of key industries represents a strategic blueprint that safeguards the nation's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underpins the great rejuvenation for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This strategic concept traces its origins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156 Projects” and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from the early ye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ra, the construction of strategic hinterland serves as an important step to explore diversifie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in the competition of uncharted territories and prevent strategic mistakes caused by locking into a single or partial development path. By review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strategic hinterland, analyzing its new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revolution, strategic hinterlands must transcend traditional notions of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outdated perceptions of being passive recipients of development, and three-dimensional spatial limitations. Instead, it should be “uncharted territories” for scientific exploration, a core region that embodies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a network hub that concentrate resource flows within virtual spaces.

Keywords: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national strategic hinterland; backup of key industries; informationization

社科学人



刘爱军，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黑龙江省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安全智库首席专家、黑龙江省应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副会长。



张三元，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



袁北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二级研究员，享受省政府专项津贴专家。



樊志宏，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武汉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